

抗日战争史论丛

四川大学历史系
成都市社会科学研究所 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国民党为什么会接受第二次 国共合作？

李世平

今年是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四十周年，海内外的炎黄子孙都会隆重纪念我们祖国近代反侵略战争中的这次历史性的光辉胜利。回顾近代历史，当祖国遭受任何外来侵略时，中国人民总是义无反顾地进行英勇斗争，不断粉碎帝国主义者独占或瓜分中国的企图，为祖国建立了不朽的功业。但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的历史条件下，历次反侵略斗争总是未能达到全面的全民族的斗争规模，因而总是未能取得彻底的反侵略斗争的胜利，未能取得象抗日战争这样的胜利，结果也就未能停止中国日益沦为半殖民地的厄运。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制定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建立和领导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掀起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大革命高潮，摧毁了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的统治。只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分裂了国共合作，造成了革命的失败。因此，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中国共产党开始单独领导了局部地区的革命战争，并逐步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的道路。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开始发动

灭亡中国的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首先号召抗日，广大人民兴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先后进行了局部的抗战和其他抗日活动。例如“九一八”以后东北地方部队、义勇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抗战，“一二八”开始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上海抗战，1933年国民党部分军队的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抗战和福建人民政府的反蒋抗日活动，1936年国民党部分军队的绥远抗战和“两广事变”的反蒋抗日活动等等。这些情况各异的局部抗战或抗日活动反映了不同阶级普遍的抗日要求，也取得一些局部性的胜利。但毕竟是局部的而非全面的抗战，总是难免受到阻碍，造成挫折以至失败，未能制止日本的侵略野心，也不可能彻底打败侵略者。根本的问题在于，“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①面对有强大的军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并蓄意灭亡中国的帝国主义的全力的野蛮侵略，如果没有全国各党派各阶层广大人民大团结的全面抗战，“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②

为什么“九一八”之后几年间，中国虽有彼伏此起的局部抗战，却迟迟不能发展成全面全民族的抗战呢？这主要是国民党蒋介石当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37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8月版。

② 同上，第470页。

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诉诸国际舆论”、“和平解决”种种妥协退让的方针，对不断发生的抗日活动则动摇、阻挠甚至破坏，尤其是全力围剿红军，而置外寇于不顾。这时的中国共产党虽首先号召抗日，并领导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和支持了其他抗日活动，但也没有及时地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领导日益高涨的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方向上去。这主要是党内的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错误。而在客观上，既然国民党反动派在“九一八”以后不断加强对红军的围剿，党和红军也不得不加强反围剿的斗争。

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关键时刻保全了党和红军的基本力量，并在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定的影响下，于12月党的瓦窑堡会议上，制定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完整策略，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方向。

这时，能否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就主要取决于国民党蒋介石是否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是否停止反共内战了。正如毛泽东等在1936年12月1日《致蒋介石》信中所说：“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之唯一出路也。”^①国共两党相互为敌已近十年，中共真诚主张“兄弟阋于墙，外御其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88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悔”，国民党蒋介石能够停止“剿共”，化敌为友，接受第二次国共合作，从而参加中国近代第一次全面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吗？历史已经作了回答。迫于形势，主要是迫于三个方面性质不同而交互影响形成的综合压力，国民党蒋介石终于接受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一）迫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侵略 中国的活动，日益严重地威胁到 国民党的统治地位

“九一八”以后，蒋介石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并非他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和严重后果缺乏认识。相反，他深知“日寇野心既一爆发，必难再改，东亚从此无宁日矣！”^① 9月21日，蒋介石从江西内战前线赶回南京召开党政军干部会议，也作出过抽调部队北上，“暂缓”围攻革命根据地的计划的决定。直到11月间南京举行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有授与蒋介石“以北上御侮之责任”的决定。但是，这些决定并未实行。相反，国民党蒋介石实行和公开宣传的是：“我国民必须上下一致，……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此时务须劝告民众，服从政府，尊重纪律，勿作轨外之妄动。”^② 同时，竭力制止和

①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20日。

② 蒋介石对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演说，1931年9月22日。

破坏正在兴起的人民抗日救亡运动。

既已认识日本的侵略野心，又要“逆来顺受”，理由何在？蒋介石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①如果暂不论蒋介石的实际政策，单就“统一方能御侮”这句话而论，似乎说法不错。历史已经证实，中国在分裂尤其是在内战的条件下，往往只能产生局部性的反侵略斗争，不能彻底打败侵略者。然而，问题是如何才能实现国家的“统一”？在日寇公开侵略的条件下，“统一”的基础只能是团结抗日，唯一的前提是国民党停止“剿共”，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后来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也是“九一八”以后广大人民的普遍愿望。国民党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则是南辕北辙。“先安内”实际上是全力扩大“剿共”内战，扩大国内的分裂和对立，“攘外”必然成为永不兑现的空头支票。这个反动政策也成为镇压人民抗日运动的依据。11月底，蒋介石对请愿抗日的学生告诫说：“拥护中央，实现统一，各尽其职，勿越法纪，御侮救国之道，尽于此矣！”接着，国民党政府的通告便诬蔑学生的救亡运动是“举动逾常”、“违国家法令”，“亦国之罪人也”。对学生实行公开镇压。这时，蒋介石显然以为对国民党政府的真正威胁在内而不在外。这是国民党的统治所代表的地主买办阶级利益决定的。12月，蒋介石一度下野后准备重新上台，以挽救国民党政府的“危机”自任时宣称：“余不入

^①蒋介石在外长顾维钧宣誓就职时演说，1931年11月30日。

京，则政府必贸然与日本绝交，绝无通盘计划，妄逞一时血气，孤注一掷，国必灭亡。”以妥协为安全，以抵抗为灭亡，这是地主买办政府历来的座右铭。

但是，处心积虑的日本侵略者不同于以往的侵略者，“九一八”事件也不同于近代中国曾经遇到的其他侵略事件。东北沦陷远非问题的终结。1932年初，日本攻占锦州，不久又发动“一二八”侵略上海的战争。蒋介石第一次感受到了日本侵略对国民党政府的直接威胁。他在力主把国民党政府迁到洛阳去时说：“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①1月30日，蒋介石发表了第一次公开抗日的通电：“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目相周旋！”2月1日，蒋介石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制定准备长期抗战的“全国防御计划”。把国民党精锐的中央警卫部队第87、88师编为第五军，任命张治中为军长，率新编第五军投入上海前线。但是，蒋介石的“决心”并没有他自己所说的那么坚决。实际上是指使上海市长吴铁城出面邀请英美驻上海总领事进行调停，求得妥协的结局。他的打算是：“我方即可乘英美干涉之机，与之交涉，不可以各国干涉，而我反出以强硬，致生不利影响也。”^②5月5日，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国民党政府以中国军队退出上海求得妥协。所谓“全国防御

①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29日。

②蒋介石日记，1932年2月4日。

计划”根本没有付诸实施。

当时，蒋介石虽然开始感受到日寇的侵略已对国民党的统治地位构成直接威胁，但认为主要的威胁还是共产党。这就是最终以妥协结束上海抗战的原因。1933年，日寇继续攻占山海关，接着进攻热河。蒋介石曾要求张学良“带兵入热河奋勇抗日”。^①并对日寇侵略步步深入的威胁，加深了认识。他开始认为日本“处心积虑，乃企图亡我整个之中华民族。……今日得满洲，明日占平津，得寸进尺，欲壑难填”。“而且必趁机打击政府，伤害领袖信用，使我堂堂中华永作彼之附庸而后止。”但他权衡“党国”利益时，仍然认为：“剿除长江流域之赤匪，整理政治，为余工作中心，……此余深思熟虑经千百回而决定之方针也。”对日寇的步步紧逼，则“非至最后关头，及确有把握可以得到相当价值，且必可保党国之时，则不作无益之牺牲。……不到时期，决不放弃基本之谋，以顾其他。”^②

蒋介石这时对“最后关头”的解释不同于后来他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的解释。可以说，除非也消灭了共产党，就不会到“最后关头”。但是，在国民党部分军队进行长城抗战以后，蒋介石初次产生抗日与“剿共”并重的思想。他提出“此时以稳定抗日战线，加强北方防御，为目前之急务，至对江西剿匪，则只有付诸湘、粤各军，逐渐紧迫而扑灭之。”^③在长城抗战中，国民党军队是比较积极的。蒋介石

①同上，1932年8月8日。

②蒋介石日记，1932年12月9日。

③蒋介石日记，1933年3月28日。

这时还提出了“革命直接对象”转变的理论，认为“九一八以前二十年中，我们和帝国主义的斗争，都是局部的冲突，没有正式的作战。我们历年来直接的革命对象，始终是国内的军阀，……九一八以来，帝国主义积极侵略的原因——一则是由于他们恐惧我们的力量，一则是我们国内再无可供他们利用的军阀。这是我们革命力量增长的结果，也就是我们革命的直接对象之转变。”^①但同时，他仍然坚持“剿共”。在并不具备两面作战的实力的矛盾中，结果，还是放弃了他所谓的对帝国主义这个“直接革命对象”的“革命”，以对日妥协屈服的塘沽协定结束了长城抗战，重新集中全力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

可见，日寇的侵略越来越严重地威胁到国民党政府所代表的地主买办阶级的统治地位，迫使他们采取某些抗日行动，甚至开始确认“革命的直接对象”已是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但是，只有在“剿共”政策破产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被迫停止内战，接受第二次国共合作，全力投入抗日战争。

(二) 迫于“剿共”政策的彻底破产 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策略的巨大影响

蒋介石从逐步感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到确认日本侵

^①蒋介石：《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与攘外》，1933年5月。

略者是“革命的直接对象”，自然是从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统治的立场着眼的，但这方面的认识也有同广大人民利益一致之处。同时，由于出自地主买办阶级的统治地位，又把共产党视为“心腹之患”，把日本的侵略视为“皮肤小病”；说什么“内疾不除，外来的毛病就不能医好，而且即算医好，也还是无济于事，到了最后，病人还是要断送在这个心腹内疾。”^①这个“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理论，完全违背中华民族的利益，违反广大人民的愿望。不放弃这个反动理论和方针，何来蒋介石所谓的“革命的直接对象之转变”？他自己也说：“残匪一日不肃清，则吾军一时不能脱离匪区。如此，倭寇进犯，虽抵抗，亦不能双方兼顾。”^②

或者是他“肃清”共产党，或者是“剿共”的彻底破产。二者必居其一，矛盾才能得到解决。1932年5月上海停战协定刚签订，蒋介石就自任“赣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率领大军，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并提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反共新方针。气势汹汹，其实色厉内荏。新方针本身表明，蒋介石虽有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却明知靠军事优势打败不了红军。他承认国民党在政治上处于劣势。他说：由于中共把“共产主义思想……灌输给一般士兵和民众，使得他们在极悲惨的黑暗生活之中，憧憬着一种和神话一样不可靠的骗人的幸福，竟使他们精神兴奋、战斗勇敢。”且不说他对共产主义的不怀好意和论述的不合逻辑，

①蒋介石：《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与攘外》，1933年5月。

②1933年12月25日蒋介石电报。

总之是承认共产主义的威力，承认“土匪宣传实胜过了我们”，承认“这是非常要紧的一种精神上的战争”。^①国民党多方加强精神上的战争，竭力扭转他们的政治劣势，效果如何呢？直接的效果就是国民党筹备半年之久的第四次围剿继续以失败告终。

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之后，国民党集中更大的兵力准备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在江西设立了“庐山军官训练团”，培养大批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干部，向他们灌输反共和“效忠党国”的思想。蒋介石在7月18日开学典礼时强调说：“我们要想到剿灭土匪，湔雪大家的耻辱，唯一要紧的事情，就是要培养全军的信仰。……对主义和上官，尤其统帅，格外要能信仰。……一定要注意恢复并培养大家的‘自信力’、‘信任力’与‘信仰力’！”^②这其实是反共政治破产的自白。仅仅由于中共党内第三次“左”倾在军事上的错误，造成红军未能打破第五次围剿，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才使党和红军一时处于危急状态，并不是国民党的剿共胜利。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胜利地纠正了“左”倾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关键时刻保全了党和红军的基本力量。这不但保证了党和红军胜利完成长征，而且在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定的影响下，于12月举行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完整策略，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领导“一

① 蒋介石：《剿匪技能之研究》，1933年4月。

② 蒋介石：《庐山训练之意义与革命前途》，1933年7月18日。

二九”运动以来全国开始形成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上去，并迅速取得显著效果。1936年，在西北参加围剿红军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实行与红军停战，达成联合抗日的协议，就是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巨大胜利，也是国民党“剿共”政策的严重破产。正如张学良所说：“共产党对东北军处境极为同情，如能联合一致对外，北上抗日，恢复东北，是东北军之唯一出路。”山西的阎锡山也“时以剿匪非计为念，理由为对内则将来无以对外也。”^①

蒋介石矢口否认“剿共”失败，只说是“功亏一篑”，其实一样，不过是说似乎本来可以不失败的。但是，1935年秋，国民党蒋介石秘令邓文仪、宋子文、陈果夫、陈立夫、曾养甫等人，从各种渠道主动“打通共产党关系”，谋求国共两党的直接接触并进行谈判，实际上已经承认“剿共”政策的失败了。谋求两党直接接触的目的何在？当时任国民政府驻苏联武官的邓文仪后来在他的《从军报国记》一书中回忆说，他奉蒋介石命，1936年3月初起，在莫斯科同苏联、共产国际人士“及中国共党在莫斯科的代表，有相当联系及恳谈，虽则谈话内容多是私人意见，并非正式外交或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但有很多意见记录下来，颇可作为政府决策的参考，我把这些意见及谈话记录毫不保留的整理成一个详细的报告，派李副武官专程送回国去。”接触的目的和恳谈的内容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国民党蒋介石的这次主动性虽出于形势所迫，但是符合民族利益，是作得

^①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转引《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第11期。

对的，是向接受第二次国共合作转变的重要起点。台湾某些书籍宣称当时是首先由中共向“国府乞降”，把国民党在历史上作得对的主动行动掩盖起来，决非明智之举。

中共中央瓦窑会议决议已估计到“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已估计到他们中间某些势力不反对或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只是因为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决议才继续采取反蒋抗日的方针。在蒋介石多方主动找共产党联系，并表现出寻求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倾向，这种信息转到中共中央之后，1936年3月4日，毛泽东、彭德怀从东征前线电复在后方瓦窑堡的张闻天、秦邦宪，提出我党同国民党谈判的原则：

（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
（二）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和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① 5月5日红军回师通电正式改变“反蒋抗日”方针，接着确定了“逼蒋抗日”方针。5月中旬，国民党陈立夫提出的国共谈判四个条件辗转传到陕北。条件是：（一）国方欢迎共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二）共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三）共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择；（四）共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② 这些条件

①见李海文：《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接触和谈判的历史过程》，《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6期。

②谌小岑：《西安事变前一年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抗日问题的一段接触》，《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第14—15页。

强调国共合作抗日，同中共提出的谈判原则一致，而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则相反。这是迫于外患日亟、反共内战破产的明显变化。关于实现两党合作抗日的具体步骤，国民党方面主张举行双方高级人员的正式谈判。曾养甫主动提出并实现了国民党武汉电台和中共陕北电台的直接联系，同时一再邀请周恩来到广州谈判。中共方面认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关键掌握在国民党手中，必须国民党方面停止进攻红军，才能进行正式谈判。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国民党“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如果你们还要继续内争，不把向内的枪口转到向外，不把退让的政策转到抗战，不把分离的局面转到团结，不把涣散的情况转到统一，则祸患之来，不堪设想”；“只有国共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而“国共合作的关键，现在是在贵党的手中”。①

但是，手握关键的国民党党蒋介石又倒退回去了。他们把中共的诚意看成是软弱，重新采取强硬方针，即蒋介石所谓“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式来解决”②。按照蒋介石的方针，陈立夫在11月10日会见中共代表潘汉年时，竟把他半年前提出的国共合作抗日的条件，换成了由国民党收编红军的条件，企图以谈判达到他们在战场上不能达到的目的，致使这次谈判无法继续下去。同时，蒋介石迳赴洛阳、西安，加紧部署西北

① 《六大以来》（上），第773—777页。

②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

“剿共”军事。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等一再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无效之后，不得不发动著名的西安事变，终于以“兵谏”的方式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初步条件。事后，蒋介石不谈他在西安承诺了六项条件，却竭力鼓吹他的“精神感召”和他临离西安前对张杨的“训词”等神话。倒是陈布雷在他的《回忆录》中暴露出真象。

“（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午，往机物迎迓蒋公，随至官邸。蒋公授余草稿一纸，命与夫人详谈。即为整理记录，于五时前赶成之，即对张杨之训词也。”所谓在西安的“训词”，其实是事后在南京由陈布雷执笔，与宋美龄共同炮制“赶成”的。不过，这一次蒋介石还是实践了他在西安被迫承诺的初步条件。1937年1月6日，正式撤消设在西安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终于停止了反共内战，解决了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关键性的前提。这又说明，在外患日亟、内战破产之际，还要加上国民党内外要求团结抗日的各种力量所施加的压力，蒋介石才不得不改弦更张。

（三）迫于国民党内外要求团结

抗日的各方面的压力

“九一八”以后，国民党内外各方面要求抗日、反对“攘外必先安内”，形成越来越强烈的政治压力，对国民党蒋介石不得不接受第二次国共合作所起的重大作用，是不应低估的。国民党左派的杰出代表宋庆龄首先于1931年12月19日在上海发表《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一文，痛

斥国民党在民族危亡之际，“竟力图镇压爱国的学生运动”，必将使中国“因国民党背弃自己的主义而亡于帝国主义”。因此，真正的革命者必“将加紧工作，朝着革命所树的目标胜利前进。”^① 她的号召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影响。以后几年间，宋庆龄团结国民党内外的革命者，为反对蒋介石的反动政策，为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取得的成绩日益显著，成为推动蒋介石从1935年秋开始谋求“打通共产党关系”的一个重要力量。1936年1月，宋庆龄派人经西安到陕北，最先向中共中央传递了国民党要求谈判的信息。所以，9月18日毛泽东致书宋庆龄赞扬说：“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而“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②。这是对宋庆龄在转变国民党错误政策中的重要影响的如实估价。

许多曾经支持过反共政策的国民党内外的知名人士，“九一八”以后纷纷成为主张团结抗日、反对对外妥协对内“剿共”的力量。从1932年4月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也能说明问题。这是国民党直接控制的会议，规定会议的讨论限于“御侮、救灾、绥靖”的范围，即以宣传和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为目的。结果，会议仍不免“脱轨”。首先是上海的黄炎培、史量才、沈钧儒、章士钊等六

①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第27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1页。

十五名会员致电会议，拒绝出席以抗议国民党对会议的限制；认为“救亡大计”在“化除杜绝合作之党治，实现全民协力之宪政”。在会议上提出的一百一十项提案中间，“御侮”居绝大多数，“救灾”次之，有关“绥靖”（即“剿共”）的提案不过七、八项，其中还有要求“对赤改剿为抚”，希望国共两党“毅然携手共赴国难”的提案。最后，会议的《宣言》也提出：“深愿全国国民不分党派、阶级，精诚团结，牺牲一切成见，共图抵抗之方策。”虽说整个会议只是表面上的过场，实际上还是表现了国民党内外广泛主张团结抗日的强烈情绪。当时，重要报刊上的团结抗日的言论也是强烈的。例如：“一、我们希望以对外的‘镇静’工夫来对内。二、我们希望以对内的‘强硬’态度来对外。”^①“当兹中国将整个的被日本军阀摧毁吞并之时，……政府必须抱与民更始之决心，另辟和平解决‘赤祸’之路。”^②“今日之‘匪’，绝非‘剿’所可‘灭’，思想不可禁锢，亦绝非禁锢所能阻遏。欲言‘绥靖’，必从澄清政治建立适合大多数人民利益之民主政治着手。”^③至于各地方实力派的抗日要求，从蒋光鼎蔡廷锴的十九路军上海抗战到福建人民政府抗日反蒋和冯玉祥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兴起等等，都起了促使国民党抗日的的作用。特别是张学良、杨虎诚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更是早获公认的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张杨不愧是推动全国抗战实现的千古功臣。

① 《国闻周报》第九卷第四期。

② 天津《大公报》，1932年1月21日。

③ 上海《申报》，1932年4月12日。